

不可避免要負失敗的責任。目前美國重申對盟國的承諾等於表示美國並不退出亞太地區。這對於毛共的政策可謂重大的打擊。故北越揮兵南下雖然達到二十年來「統一越南」的願望，但對於毛共的政策有重大的影響，引起毛共頭目的不滿自屬意料。

註④Robert Blu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6), pp.

366-37.

註⑤David P. Mozingo, "Containment in Asia Reconsidered," *World Politics*, Vol. XIX, No.3 (April 1967), pp. 366-67.

註⑥Donald Lancaster, *The Emancipation of French Indo-Chin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316.

註⑦「人民日報」，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

註⑧「人民日報」(社論)，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註⑨「全世界人民行動起來，迫使美國侵略者從越南滾出去」(社論)，「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六日。

註⑩「人民日報」(社論)，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註⑪「越南快報」(河內)，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註⑫「人民日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1964-June 1968, p. 77.

註⑬Richard J. Walton, *Cold War and Counterrevoluti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John F. Kennedy*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2), pp. 164-195. Walt W. Rostow, *The Diffusion of Pow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2), pp. 264-279.

註⑭「人民日報」，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

註⑮「人民日報」(社論)，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註⑯「人民日報」(社論)，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六日。

註⑰「人民日報」(河內)，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註⑱「人民日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毛共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意義

裘孔淵

一 從四屆偽「人大」到理論學習

運動

以「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四屆偽「人大」的結果，雖然所謂「毛澤東路線」已經用「憲法」的形式固定了下來，但由於下述兩項原因，使得毛匪難以滿意，也使今天掌握着黨權的官廷派心懷憂慮：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到十七日在北平舉行的第四屆偽「人大」第一次會議，只是毛共長期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的里程碑，而不是終結，鬥爭將以新的內容和形式繼續展開。四屆偽「人大」的「新聞公報」和張春橋修改偽憲法的報告，都曾提出了要「認真執行」和「勇敢捍衛」新修改的偽憲法，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羣衆集體所有制」，但仍保留了部份所謂「資本主義殘餘」或所謂「資產階級法權」。(第七條「……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牧區社員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第八條「……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國家保護公民的勞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

第二、爲政權人事的新安排，是毛匪「安定、團結」要求下勉強妥協的產物，宮廷派雖然由算得了黨權，進而進入了僞「人大常委會」、僞國務院，並插足了匪軍首腦部，但老幹部和匪軍實力頭目的勢力仍相當強大，打而不倒，被「解放」幹部「心存報復」^①；毛匪接班人問題並未解決，宮廷派沒有獲得真正的優勢。換毛共的說法，就是「革命團結」有待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還沒有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並未鞏固，在毛匪生前和死後，「毛澤東路線」也都沒有必然貫澈的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會半途而廢，資本主義的復辟就隨時可能發生」^②。

所以，毛匪和宮廷派急切需要在四屆僞「人大」落幕後立即發動一個「思想教育」運動，爲新的政治需要製造輿論。這一思想教育運動，就稱爲「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內容有兩項：一是學習爲何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二是學習爲何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

運動的開始，表面上似乎是從二月九日人民日報社論開始（題：「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傳達毛匪最近關於理論問題的講話），事實上，在此之前，人民日報都已刊載了「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二期有關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學習這一理論的文章^③；同時，可以認定，毛共中央會於四屆僞「人大」閉幕後發出過一個重要文件——「關於認真組織廣大黨員、幹部和羣衆學習毛××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④。

所謂毛匪「最近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毛共並未公佈全文，其有關的片段，只出現在人民日報二月九日社論和二十二日該報與紅旗雜誌的「編者按」內，以「編者按」的引述爲正式。迄至四月爲止，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所刊載關於學習理論問題的論文很多，其中以姚文元「論林彪集團的社會基礎」、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兩篇最爲重要，具有代表性；所以，現在大陸各省市的學習運動中，除了號召學習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毛匪有關「無產階級專政」和所謂「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個別論述文字外，還明白提出了要一併學習上述張、姚兩人的文章。

，也沒有提到新修訂的僞憲法，從已發表文字的語氣看，毛共內部在它的「十大」（一九七三）以後到四屆僞「人大」以前，曾經有過關於政治路線和經濟政策的激烈論爭，這次所傳達的毛匪講話，可能便是他對論爭所表明的態度^⑤。這一論爭，事實上從毛匪高唱「三面紅旗」甚至從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以來就長期存在。張、姚兩匪的文章，可能會在毛共「十屆二中全會」或「中央讀書班」一類場合中出現過^⑥。

二 堅持專政的「必要性」和理論 學習的「重要性」

綜合毛匪最近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講話，張春橋、姚文元兩人的論文，以及圍繞於毛匪講話的文章，大致可分爲五個部份：一是說明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二是指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重要性；三是解釋今天大陸仍然存在着「資產階級法權」，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四是指陳「新資產階級分子」的產生和路線鬥爭、權力鬥爭長期持續的必然性；五是期望通過這一次的學習運動，能「促進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促進全國的安定、團結」，並促使所謂「國民經濟新的躍進」。

關於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二月號紅旗雜誌路陽文章「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說：「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強化自己的國家機器，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在社會主義時期，要不要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這在毛××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劉少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之間存在着原則分歧」，也就是說，堅持「專政」還是有限度的「民主」？這是過去毛共內部路線鬥爭的一部份。文章說：毛匪在僞政權成立的初期，就說過「我們必須牢牢地掌握這個武器」（指所謂「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國家機器」）。又說，四屆僞「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僞憲法裏，「充分反映了毛××的這一重要思想，規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和政策。」也就是說，新僞憲法是一個體現「無產階級專政」精神的文件。文章具體指出的九項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⑦，也就在強調堅持專政的必要

性。

「紅旗」同一期池恆的文章「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說：「我國正處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在這個歷史階段中，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消滅資產階級，並經過長期的鬥爭和改造，逐步造成資本主義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還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培養資本主義產生的土壤，讓地主資產階級重新上台，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這是一個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歷史命運、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歷史命運的根本問題。」

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重要性，是毛共這次整個理論學習運動的主題，是為了傳達並闡釋毛澤東最近的「重要指示」：

「列寧爲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⁸⁾

何以要學習？毛共報紙說，通過學習，才能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四大任務：「一、鎮壓被推翻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反抗，二、防禦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顛覆和侵略，三、同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資本主義勢力、資本主義傾向作鬥爭，四、對仍然存在的那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加以限制。」⁽⁹⁾「從而更加自覺地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批判資本主義傾向，批判資產階級世界觀，促進和加強廣大羣衆的革命團結。」⁽¹⁰⁾

紅旗雜誌的文章說：「不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不了解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規律，不懂得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和任務，不看到現實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要真正理解和平澈執行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真正理解和平澈執行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是不可能的。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如果思想上是糊塗的，在行動上就不可能是有力量的，甚至是錯誤的。不把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搞清楚，就會修正主義。」⁽¹¹⁾所謂思想上糊塗，是指「不看到現實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以致行動上錯誤，「會變修正主義」。對此，毛共說：「由於在理論上分辯不清，甚至把資本主義的東西當作社會主義的東西，把修正主義的口號當作馬克思主義的口號。」⁽¹²⁾香港的毛共更說：「在四屆人大開會前後，有這樣想：開過四屆人大，祖國的政治局面大概會風平浪靜，完全安定下來

了。這種想法是不對頭的。萬事大吉的情況是不會出現的。」⁽¹³⁾毛共在內部告訴它的幹部說：理論學習，「這是當前一項極爲重要的迫切任務」，「如果我們不狠狠打擊和鎮壓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不去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肅清資產階級和舊社會習慣勢力的影響，同資產階級的生活作風，同新產生的或正在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作鬥爭，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會半途而廢，資本主義的復辟就隨時可能發生。所以能不能把對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搞清楚，是一件關係到我們黨、國家和人民的歷史命運的大事情。」⁽¹⁴⁾學習運動在現實意義上的重要性，於此可見。

三 所謂「資產階級法權」問題

毛共報刊所透露的毛澤東最近所作關於理論問題的四段講話，其中關於大陸社會制度的說法如次：

「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¹⁵⁾

毛匪的講話，雖然並未使用「資產階級法權」這一名詞，但所講的就是所謂「資產階級法權」⁽¹⁶⁾問題。姚文元、張春橋的文章，都解釋了毛匪講話的意義在於指出：今天中國大陸的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換方面不可避免還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應當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而張春橋的文章更深入地列舉了中國大陸在所有制變更之後所存在的現實，這些現實就是由於「資產階級法權」還存在於各方面。張文連續提出幾個「必須看到」，一是必須看到所有制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在短時間內，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並存的局面不會有根本改變），二是還必須看到企業的領導權掌握在那個階級手裏的問題，三是還必須看到在短時間內商品制度仍然存在；由於所有制和分配制存在着這些問題，由於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範圍內仍然存在，「城鄉資本主義的因素便得以發展，新的資產階級分

子就一批一批的產生出來。」¹⁸

一九五八年八月，匪黨在北戴河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並決定發動「全民大煉鋼」運動，「三面紅旗」的高潮由此開始，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涉及到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問題，認為爲了「大躍進」的需要，講等級的「資產階級法權要破，天天破」；在僞政權沒有建立以前，過的是「平均主義」的「供給制」生活，「完全不是靠物質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一九五三年改爲薪金制（工資制）後，反而問題叢生了。¹⁹

究竟所謂「資產階級法權」涵義爲何？毛澤東曾經說過：「資產階級法權，表現爲資產階級法律教育。」²⁰毛共對內的教育資料說：「法權，是指社會的統治階級爲維護本階級的利益，而提出和規定的一些法律原則。」「資產階級法權的特徵，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事實上的不平等，也就是說，作爲資產階級法律上所規定的所謂平等權利，都是以事實上不平等爲前提的。」「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應該認識到，它畢竟是共產主義的東西，將來終究是要歸於消滅的。無產階級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在這個最終目的實現以前，分配和貨幣交換中不可避免地還存在着資產階級法權，在工農、城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還存在着差別。」²¹何以說「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因爲「在等量勞動領取等量報酬的條件下，體力強，技術高，贍養人口少的人，生活就會過得好一些；反之，就會過得差一些，出現事實上的不平等。」²²可見今日毛共所說的「資產階級法權」，主要是指「按勞分配」原則下的等級工資制度而言。事實上，當年毛匪和張春橋所提「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內容，也是集中於等級工資制度而言的。

張春橋是當年迎合毛匪「破除論」最力也是最早功臣。一九五八年北戴河會議後，張寫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刊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而由人民日報於同年十月十三日轉載，文前並加了「編者按」，說明這是當時的一個「重要問題」，需要討論，說「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讀。」從這開始，人民日報便闢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專欄，每天刊登贊成和反對兩方面的文章，反對者則指「破

除論」是小資產階級的「絕對平均主義」。論戰一直持續到次年春，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失敗，「破除論」隨之收斂。張文的論點集中在贊揚北平僞政權成立以前長期以「供給制」爲核心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活」，而不滿以後的「等級工資制」，他要求爲了「大躍進」，而「徹底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

「資產階級法權」這個名詞，是從馬克思著「哥達綱領批判」一書的中譯本而來，書上說：「這裏平等的權利在原則上仍然是資產階級式的法權」²³。但據匪黨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副局長張仲實說，這個名詞改譯作「資產階級式的權利」較符原意。因爲德文中的Recht，俄文中的Zapavo，有好幾個意思，其中一個是「權利」，又有一個是「國家制定的法律規章的總稱」；這個字「統通譯做『權利』，比較確切」，因爲馬克思在這裏是從權利的角度，從是否公平、平等的角度來講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而不是從法律規章的角度來講這個問題的。²⁴由於張仲實的這一糾正，人民日報的討論專欄名稱，也就改爲「關於資產階級式的權利問題的討論」。

從最近毛共再度提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來看，毛匪和張春橋等顯然繼續沿用了原有譯名，而並未改正。

四 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態度

從一九五八年到現在，毛澤東本人及其一派，對於「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只承認要加以「限制」，要「破除」一部份而不是「破除一切資產階級法權思想」²⁵。最近的毛匪講話，也是說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毛共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們既要承認它，又必須限制它，逐步消滅它。」²⁶也就是說：「既要看到它存在的必然性，又要看到限制它的必要性。」²⁷張春橋說：「我們從來認爲，我們國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豐富。只要公社還沒有多少東西可以拿出來同生產大隊、生產隊『共產』，全民所用制也拿不出極爲豐富的產品來對八億人口實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繼續搞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對它帶來的危害，我們已經採取了並將繼續採取適當辦法加以限制。」²⁸「如果不加限制，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就會更

快地發展起來。」²⁹

據毛共說：「既要『限制』，就不能『把資產階級法權看作是凝固不變的・把它固定化、系統化、擴大化』。」³⁰如果有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而是「要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範圍和作用逐步加以縮小，並從思想上、物質上積極創造條件，以達到將來的最後取消。」³¹前者，意味着毛匪及其一派對四屆偽「人大」修訂的偽憲法仍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的憂慮和某種不滿³²；後者，毛共曾說明，是指一九五八年以來，在「毛澤東路線」之下，毛共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支持和扶植了許多所謂「社會主義的新生物」，猛烈的「沖激」³³了資產階級法權，如像「全黨辦農業」、「走五七道路」、「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發動教育、衛生、文藝等領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³⁴等等，這意味着毛匪的一套和所謂「文化大革命路線」，在四屆偽「人大」後，將更仍為今日毛共當權派所堅持。

另一方面，毛共也提出了在「限制」分配和現行商品制度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要避免過急過左。據指出：「認為現在可以取消『按勞分配』的原則，不需要執行現階段農村的分配政策」，以及「主張立即取消商品生產和交換，取消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以及國家領導下的集市貿易」，都是犯「左」的錯誤；同時，企圖一下子就解決「消滅三大差別」這個問題，是一種「脫離實際的情緒」，要加以防止³⁵。因此，「對於政策方面、制度方面的問題，要慎重從事，凡是已規定有具體政策的，要按照政策去辦，不要隨便變動。」³⁶

從這裏可以看到，毛共在一面強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一面却力戒過左，要對政策、制度「慎重從事」，說明它正深深陷於左右搖擺的矛盾之中，也正反映了它今天內部存在着激烈路線鬥爭的事實。

毛共一再說，毛澤東最近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指示」，「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³⁷。所謂歷史意義，照張春橋的解釋，是說匪偽政權「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發展時期」，「在整個社會主

義歷史階段中，能不能始終堅持無產階級」，是關係匪偽政權「發展前途的頭等大事」；所謂現實意義，張匪也說是由於「現實的階級鬥爭」要求「搞清楚無產階級專政問題」³⁸，明白的說，今天毛共有着嚴重的統治危機，毛匪及宮廷派是希圖通過一場學習運動或思想鬥爭，來為新的政治鬥爭作輿論準備，達到強化黨的專政權力，鞏固和延續統治的目的。這一願望，本來就是召開四屆偽「人大」的主觀目標。

毛匪在四屆偽「人大」召開前夕，曾向全黨發出了「安定、團結」的呼籲³⁹，在掀起這一次理論學習運動中，從紅旗雜誌的文章到地方電台的報導，也衆口一詞，強調學習要「緊密聯繫實際」，要通過運動「落實安定團結的方針」、「進一步促進全國的安定團結」⁴⁰，「進一步推動工農業生產的大上、快上」，「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⁴¹，可見今天毛共現實的統治危機，主要是政治分裂和社會動亂，及因此而造成的經濟困難。

第一、就全般政治情勢言，毛共集團內部依然明顯的存在着尖銳的路線鬥爭與權力鬥爭。

毛匪本人講話及張春橋、姚文元等的文章，都提到了還會有發生「林彪」一類「上台」並篡權「復辟」的可能，呼號「決不能放鬆警惕」、「切不可麻痹大意」。張春橋特別對當前偽政權的統治情勢作了描述，他說：「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還是很激烈的。」「資產階級的土匪子還很多，打掉一個還會長出一個」⁴²。

在這一情勢之下，毛共內部對所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線問題，大致表現為如下三種態度：(1)一種是堅決擁護毛匪路線，認為應該在「一切領域」、「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決不能「留下一些」、「半途而廢」、「讓它再擴大隊伍」、「變成保護資產階級特別是保護新生的資產階級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到底」的一派。這一派，在最近被人指為「刮『共產』風」⁴³。(2)與此相反的是被張春橋他們稱為刮「資產」風、「名曰共產黨員，實際上是新資產階級分子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財產佔為私有，他們在「表面上也會裝作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而實際上幹的仍然是復辟資產階

級專政」，他們「打着毛××的旗號打擊毛××的力量」，「有時候『順』着無產階級，甚至裝得比誰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號，製造混亂，進行破壞」⁴⁴。（二）在這兩者中間的是「糊裏糊塗的跟着修正主義路線跑」⁴⁵的「經驗主義」者，他們「由於在理論上分辨不清，甚至把資本主義的東西當作社會主義的東西，把修正主義的口號當作馬克思主義的口號」⁴⁶，他們「對商品制度、貨幣交換、按勞分配等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分不清路線是非，甚至對它抱有極大的興趣」⁴⁷。

以上（一）（二）兩者，事實上是合二爲一的龐大勢力，第一種則居於少數，雙方的衝突，構成了今日毛共黨內各級「領導班子中的兩條路線鬥爭問題」，也就是今日毛共各級組織內部權力鬥爭的主要因素。毛匪及宮廷派還提出「要警惕階級敵人利用民主的口號來破壞黨的一元化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強調「在高度集中下的民主」，全黨、全軍都要在以毛匪爲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以毛匪路線爲基礎，去實現「專政」⁴⁸。可見在這一鬥爭中，還有分權和獨裁之爭的內容。

第二，在現時匪偽「國營經濟」制度方面，張春橋復述了毛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匪黨九屆一中全會上的一段話，毛匪說「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羣衆手裏。」「無非是搞什麼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麼獎金，等等」⁴⁹。這些匪偽企業和工廠的領導幹部，照毛共自己承認，「在他們把持的部門和單位不服從國家計劃，推行『利潤掛帥』，搞資本主義經營，利大的大幹、利小的小幹，無利的不幹。這樣，就會造成某些商品供不應求或供過於求的現象，使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發生矛盾。一些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就會利用供求之間存在的這種『缺口』，以互相支援爲名，行互相利用之實，擅自動用國家、集體的資金、設備和產品，搞以物易物，套購國家物資。在這種所謂『協作』中，什麼損公肥己、營私舞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見不得陽光的勾當，他們都會幹得出來。」⁵⁰毛共稱這種現象是「把企業引入修正主義的歧途」⁵¹。可見迄今爲止，在匪偽的所謂「社會主義經濟」中，最大的問題依然是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

第三，在農村集體經濟制度方面，張春橋指出「全民所有制在作爲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方面還很薄弱」，「全國的糧食和各種經濟作物，百分之九

十以上是集體經濟生產的。國營農場所佔比重很小。此外，還保留着少量的社員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在農村還保留着相當數量的集市貿易。」⁵²這是說，大陸上農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還很龐大，「發財致富」的「資本主義傾向」，還很強烈。根據毛共自己最新社會調查的資料，「農民小生產的固有特點、小農經濟的思想殘餘還存在，在農村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總是頑強地表現出來。」也像「搞副業單幹，或者打着『爲集體』的旗號，搞資本主義的活動：有的甚至棄農經商、投機倒把，瓦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⁵³所謂「棄農經商」，就是農民生活過苦，不得不「外出找工作，抓現錢」，做點「小買賣」之類⁵⁴，農村幹部本身就是農民，他們多數當然同情農民爲解決「缺吃少穿」的生活困難而從事自求生存的活動，所以毛共也指責農村幹部的「對資本主義不敢批、不敢鬥」⁵⁵的消極態度，同時承認「對幾億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始終是一個嚴重問題，需要幾代人的努力」。⁵⁶

第四，在社會治安方面，毛共正式透露了大陸社會現時有「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的存在⁵⁷。造成社會問題的因素，除了大家熟知的爲抗拒下放或下放後逃回城市的知識青年問題以外，主要還有毛共一直隱瞞不敢公開的工人問題和復員退伍匪軍問題。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毛共中央「中發〔一九七四〕二十一號」文件，暴露了大陸工人對工資問題強烈的不滿情緒，以及對經濟政策和領導作風的分歧態度，爲此，他們「公然煽動停工、停產」，「搞跨地區、跨行業的串連，拉山頭、打內戰」，以致煤炭大幅減產、交通運輸堵塞，進而導致了各類工業普遍大量減產。該文件呼籲「堅決絕住經濟主義妖風」，並允諾「對於羣衆中提出的有關勞動工資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一律放到（批林批孔）運動的後期，經過調查研究、具體分析後，統籌解決。」⁵⁸現在姚文元、張春橋等人的文章，先後將工人問題歸因於「資產階級的物質引誘和各種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捧場」上面，歸因於「老奸巨滑的老資產階級分子」以「關心愛護共產主義接班人」爲名，用「物質刺激」，去「教唆」和「刺激」青少年（主要指青年工人特別是當了幹部的青年工人）「走資本主義道路」、「違法亂紀」⁵⁹，而提出了「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加強工人階級團結」、「反對資產階級的腐蝕」、「工人階級必須改造自己」、「加強工人階級團結」、「無產階級的

必須有鐵的紀律」等等口號^⑥，說明當前工人問題的嚴重性，也說明了毛共當局已推翻了去年對工人所作的承諾。

一九七四年間，復員退伍軍人為要求較好的工作安置和爭取平等合理的待遇，曾普遍有串連、張貼大字報、集體請願等行動，並與公安警察及工人民兵發生流血衝突事件，匪偽政權無法有效解決，已為不斷來自大陸的消息所證實^⑦。毛共報刊雖然沒有公開透露，但最近正着重宣揚匪軍「部隊復員戰士在復員時，堅持社（人民公社）來社去，回到農村繼續革命」的事蹟，說這「對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逐步縮小三大差別，具有現實的意義」^⑧，可以反證這一問題的確存在。

以上情勢，是毛澤東堅持左傾冒進路線與宮廷派堅持「共產風」的後果，也是「文革後遺症」（王洪文語）的繼續發展。

六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對四屆偽「人大」以後毛共展開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可以獲得如下的認識：

(一)毛匪在客觀的分裂動亂情勢，與主觀的「安定、團結」的願望下，全力建立了各派勢力間的暫時妥協，而草草召開了拖延達十年之久的四屆偽「人大」，目的在緩和現實的矛盾，延續對大陸人民的統治。但四屆偽「人大」的結果，偽憲法仍然保留了所謂「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人事安排並沒有達到真正的團結，更沒有解決毛匪權力繼承問題，因而毛匪路線並沒有獲得堅持貫徹的保證，使宮廷派難以滿意並心懷憂慮，於是發動了這一次的理

論學習運動。名義上這是一次新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質上是一次的思想鬥爭，是一次新政治鬥爭的前奏，也可說是「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延續，大陸情勢正在醞釀突變。

(二)鑑於客觀的反毛澤東路線傾向（所謂修正主義思想、資本主義傾向、資產階級法權觀念）之強烈，反宮廷派勢力的雄厚（即所謂「老奸巨滑的老資產階級分子」與一批又一批產生的「新資產階級分子」），使得宮廷派不敢明白承認要「刮共產風」，也不敢正式強調要立即「破除一切資產階級法權」，而只能宣傳加以「限制」，並提出對政策和制度的變動要「慎重從事」。對運動的方式，不得不採取羣衆性的「學習與批判」，「大造輿論」，「聯繫實際」，企圖迫使毛共全體黨員和大陸人民接受並服從毛匪左傾冒進的路線，並便利宮廷派的接班。

(三)毛共雖然強調要通過學習運動以「促進安定團結」，但他們向來遵循毛匪「以鬥爭求團結」的教條，因此，面對現實情勢，由這一理論學習運動所即將引發的新政治鬥爭，它的對象，將包括三個層次：一是毛共各級領導幹部^⑨；二是毛共一般黨員、中下級幹部，也就是毛匪所稱有着「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人；三是廣大的人民羣衆，包括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農民、青少年，以及復員退伍匪軍等。毛共不諱言引述列寧說過的話：「清洗混進黨裏來的人」，更強調要「批評和整掉那些腐蝕我們思想、危害革命事業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同修正主義劃清界限」^⑩，可見理論學習運動確是即將到來的「全黨清洗」與「全民整風」的訊號。

註①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報告。
註②雲南人民電台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播：匪黨雲南省委三月八日到十五日召開「理論工作會議」新聞稿。

註③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六日人民日報池、路陽的文章。文章也都提到了「資產階級法權」。二月五日安徽人民電台播送安徽日報社論，也已有「新的資產階級分子、蛻化變質分子」的說法。

註④同註②。

全一冊新台幣貳佰元

國際關係研究所代售

中共延安時期之政治經驗

曹伯一著

註⑤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毛共中央中發字（一九七四）二十一號文件「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中曾說：「中央重申：當前為集中力量搞好批林批孔，對於羣衆中提出的有關勞動工資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一律

放到運動的後期，經過調查研究，具體分析後，統籌解決。」

註⑥張春橋文章中有這樣的話：「只要我們幾百個中央委員、幾千個高級幹部帶頭，同廣大幹部羣衆一起認真看書學習，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我們一定能够實現毛××的號召，搞清楚無產階級專政問題，……」

註⑦九項任務的內容是：「必須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份子」、「必須鎮壓一切叛國的和反革命的活動，懲辦一切賣國賊和反革命份子。」「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份子，也必須實行專政。」

「必須對一切資本主義勢力和新生的資產階級份子進行鬥爭，改造小生產者和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工人階級必須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也必須改造自己。」「『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按：此為新偽憲法第十二條文字），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批判一切腐朽沒落階級的意識形態，決不允許他們自由泛濫。」「必須根據可能的條件逐步縮小而不是擴大工農、城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必須貫澈執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在革命統帥下，努力增加生產」、「必須加強軍隊建設，加強戰備」。

註⑧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人民日報社論。

註⑩同註⑧。

註⑪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二期池恆文章。人民日報二月二日轉載。

註⑫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社論。

註⑬同註⑨。

註⑭毛共雲南省委於三月八日到十五日在昆明召開了理論工作會議，會後匪雲南人民廣播電台於三月二十五日廣播。

註⑮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者按」。

註⑯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六日分別刊載了紅旗雜誌池恆、路陽的文章，都提到這就是「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同報二月九日的社論也這樣指出。

毛共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意義

註⑰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註⑱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四期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註⑲毛澤東的觀點見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鄭州所作關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二五〇頁；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蘇聯『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同書三六二、三六三頁。

註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二四九頁。

註㉑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香港文匯報。該報負有對海外毛共黨員思想教育任務。

註㉒同註㉑。

註㉓「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二卷中譯本二二二頁。

註㉔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張仲實文「對於『資產階級法權』一語譯法的意見」。

註㉕同註㉔。

註㉖一九七五年三月九日香港「文匯報」轉載北平「光明日報」文章「對資產階級法權必須加以限制」。

註㉗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四期紀岩文章。

註㉘同註㉗。

註㉙同上。

註㉚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一日北平光明日報「解放軍總後勤部企業部理論小組」文章。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也說不能「要求鞏固、擴大、強化」它。

註㉛同註㉚。

註㉜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二期姚文元文章有「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資產階級法權復辟」之句。

註㉝同註㉜。

註㉞同上。

註㉟同上。一九七五年三月八日到十五日毛共雲南省委召開了理論工作會議，也決定「對於各種重大的政策性的問題，不要急於去解決，要取慎重樣指出。

態度。」見雲南人民電台三月二十五日廣播。

註³⁷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人民日報社論。

註³⁸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四期張春橋文章。

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說：「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註⁴⁰「進一步促進安定團結」的說法，在最近的報刊中幾乎隨處可見。

如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姚文元文章，第四期短評，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社論，及廣東、湖南、安徽、雲南等省電台三月間的廣播。

註⁴¹同註³⁶毛共雲南省委理論工作會議的說法，其他各省亦多相同。

註⁴²同註³⁸。

註⁴³這一派即是宮廷派，可以張春橋、姚文元為代表。請參閱紅旗雜誌

一九七五年第四期張春橋文章。

註⁴⁴同上。

註⁴⁵雲南人民電台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播。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姚文元文章亦如此說。

註⁴⁶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社論。

註⁴⁷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四期紀岩文章。

註⁴⁸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二期路陽文章。

註⁴⁹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四期張春橋文章。張在四屆偽「人大」所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中也說：「有些單位，形式上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實際的領導權並不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廣大工人手裏。」

註⁵⁰同註⁴⁷。

註⁵¹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註⁵²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四期「北京部隊某部八連全體復員戰士」文

章。

註⁵³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四期毛共山東省魚台縣委員會調查組文章。

該文列舉魚台縣相里大隊的「小買賣」行為不過是「私自搞編織、麵食、宰羊、剥狗、茶爐、理髮、裁縫等三十多種個體副業」。

註⁵⁴同上。

註⁵⁵同註⁵²張春橋文章。

註⁵⁶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二期路陽文章。一九七四年毛共中央二十一號文件也有同樣透露。

註⁵⁷二十一號文件全文見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中國大陸」月刊第八十八期。

註⁵⁸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三期第四期姚文元、張春橋文章。

註⁵⁹這些口號散見於一九七五年二月以來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紅旗雜誌的文章中。而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四期卷首還特意刊載了一段毛匪聲色俱厲的語錄：「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勞動者也要改造，誰說工人階級不要改造？」

註⁶⁰從大陸的消息中知道復員退伍軍人問題的突趨嚴重，與「批林批孔」運動中加速匪軍部隊大量「汰舊換新」有關。復退軍人鬧事的省區，已從廣東、廣西蔓延到了湖南、湖北、安徽、福建、浙江、江蘇等省區，而且都有與城市產業工人對抗的跡象。

註⁶¹同註⁵⁸。

註⁶²毛共報刊多數文章都要求「領導幹部」要做到「三帶頭」：「帶頭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帶頭做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模範，帶頭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先鋒戰士！」見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社論。

註⁶³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四期短評。

創造文化的基本條件

——中華民國社會的澈底研究——

福永安祥著 趙倩譯

實售 新臺幣二十元
美金六角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